

汉学家梅维恒印象

叶舒宪

我在1993年初调离西安，远涉琼州海峡，到海南大学继续教书生涯。为了写《庄子的文化解析》而进图书馆寻觅资料。这是一座仅有十余年历史的大学，图书馆也仅有十余万册藏书。建校前的出版物若非有人捐赠就不能奢望在这里找到。所以来时就没抱多少希望，只想碰碰运气。当我在仅有屈指可数几架书的外文库中发现这本《实验的庄子论集》（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时，那意外的惊喜似不亚于阿里巴巴的洞中遇宝。

书前扉页上印有“美国亚州基金会赠书——上海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分发”的图章，表明其来历已途经近半个地球，在国内即便不是孤本也不会有多少复本的。该书1983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作为“夏威夷亚洲研究系列第29号”而印行，编者名叫维克多·迈尔（Victor H. Mair），共收入英、美、日等国学者的论文九篇。迈尔在序言中写道，编辑本书的目的在于把庄子引荐给更多的西方读者。目前有关这位中国哲人的知识仅限于汉学家和少数研究比较宗教学的人，这太令人惋惜了。因为庄子之书要比许多在西方流行已久的中国作品高明得多。可以说在佛教传入以前，没有一部中国书能在文学想象方面同《庄子》相比于万一。

一个外国人用如此口气对我国道家的亚圣作出极为推崇的评价，着实要让人刮目相看。这种从比较中见高下的评语又使人想起席勒初读古印度梵剧《沙恭达罗》后的感慨和过激之词：“在古希腊，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在美妙的女性温柔和美妙的爱情方面与《沙恭达罗》相比于万一。”这种墙内之花在墙外更香的现象背后有没有所谓“文化误读”的机制作用，很值得理论家去探讨。语出惊人的迈尔先生就这样伴随着我的庄子研究而留在心中了。

1995年春，赴台北参加由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

讨会”。4月23日上午轮到我发言，论文的题目是《庄子与神话》。在我之前宣读论文的是一位高个子的美国教授，他走上讲台时在麦克风旁放下一大一小两只葫芦，讲述和答辩的过程中还不时地举起葫芦示意，给紧张的会场带来阵阵轻松的笑声。翻阅论文后才发现，这位中文名字叫梅维恒的汉学家不是别人，就是我读其书而想见其人的“迈尔”先生。他这次提交的英文论文题为《中国南方葫芦神话及道家的借用》（Southern Gourd Myths in China and Their Appropriation by Taoism），文中引伸刘尧汉教授关于彝族葫芦崇拜为中华葫芦文化之源头的观点，结合日本和西方汉学界的成果，论证了葫芦神话母题在中国文化中的传播轨迹和在道家思想、道教仪式与传说中的诸多变体。就引证和参考书目来看，这是我所见到的在此一课题方面用功最勤的论述。不过就彝苗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中的葫芦母题究竟孰先孰后的问题，我还是提出了不同看法。

会后我们成了相互切磋的学友。他很快如约寄来两部新著：他英译的《庄子》和马王堆帛书本《道德经》；这都成了我研究老庄的重要参考。

一年后，我赴加拿大访学。在康克迪亚大学新闻系的专家指导下学习用国际互联网发送电子邮件。手头恰好有梅维恒教授前不久的一封来信，上面有他在美国宾州大学的电子邮箱的地址。我刚刚学会的网络通讯技术就这样派上了用场，试着发了一封电子信，告知梅教授拟在近期赴美登门拜望。一天后我去渥太华大学英语系访问文学批评家Bossiere，就此离开了康克迪亚大学，不知道梅教授次日回复的电子信件已欣然而应允我的访问计划。

过了一周，办妥赴美签证，我乘“灰狗”穿越美加边境，来到纽约寻访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同窗密友王海龙君。六年不见，自有说不完的话题，从吉尔兹的人类学方法到美国汉学的现状，从海南岛的热带气候到国内近年来的文化热。海龙君忽然拿出一份复印的材料让我看，那是1996年5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一整版图文并茂的报导：《木乃伊与纺织品证明古欧洲人到达远东》。从题目看很有点耸人听闻的效果，就像我们常见的“古代中国人发现美洲”一类说法。文中介绍一位美国探险家到新疆研究考古新发现的经历。海龙君说这在西方学界乃至大众传媒界都算得上爆炸性新闻。我仔细打量照片中那位蹲在哈密沙漠里为干尸画素描的探险家，不禁叫出声来：“这不是梅维恒吗？他明明在研究葫芦神话，怎么又到了新疆戈壁去挖掘古欧洲人祖先的遗体呢？”

在海龙君的劝说下，我终于带着疑虑，踏上开往费城的火车，前去那以苏美尔文明考古研究著称于世的宾西法尼亚大学。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会晤。用午餐时，梅教授向我打听一个中国人，说这个人写过一本叫《英雄与太阳》的书，其中探讨到中国神话文学与巴比伦文明的因缘。他说他对此十分感兴趣。当我回答“这个人就是我”时，对方睁大眼睛，连续地感叹道：“是你呀！”中国人的踏破铁鞋之喻和西方人的世界真小之叹，在这里同时派上了用场。

原来，正像我认不出维克多·迈尔就是梅维恒，他也不能将我的中文名字叶舒宪同电子邮件上的Ye Shuxian对上号。

国内学人对于汉学家有一种看法，以为他们视野很受专业的局限，总喜欢在针尖或芝麻上大作文章。自1990年去澳大利亚访学时曾经入住汉学家马泰博士的家里，到1995年元月在海口召开的首届中国国际汉学会议，再到200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世界汉学大会，我已经记不清二十几年间结识过多少汉学家。在海口会议上，曾就汉学家的研究领域请教过英国的龙彼德先生，记得他的高见是尽量集中注意深钻小问题，比如他本人十多年来从事的《西游记》研究。这个答复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人们对海外汉学的看法。这一次我就

同样的问题请教梅教授，他的答复仅有两个词：“没有边界。”

对于“家法”森严的传统学者来说，这样看待学问，若不是好高务远，至少也是用心不专。能够从《庄子》跳到葫芦神话，又从葫芦跳到木乃伊的这位洋博士，他的研究道路本身不就验证了学问“没有边界”的道理吗？后来再看世界体系论的大师沃勒斯坦等合著的《开放社会科学》，总算能够对“没有边界”的求学好处有些深切的体会，这使得我几十年来坚持在跨学科方向进行探索，走出了文学人类学这样一条宽广的路。

追问“没有边界”的自觉意识之由来，我发现中外学者之间有很大差异。就西方汉学家而言，能够从自己熟悉的西方语言文化跨越到冷僻而难学的汉字和汉学，这一类学人本身就多少具备越界精神和不为学科界限所局限的魄力。而我国的科班学者一般以坚守本学科领地为荣耀，对超出界限的知识和探索兴趣不足。往往是非科班出身的自学成才一类学者，才胆敢做出“没有边界”的学术思考和探索。萧兵和何光岳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如此。反思我国科班学人与汉学家的知识结构差异，我们的教育制度造成的学科本位主义显然是弊大于利的。但愿大家都能明白一个道理：语言可以成为牢房；学科也同样能够拘禁我们。

—